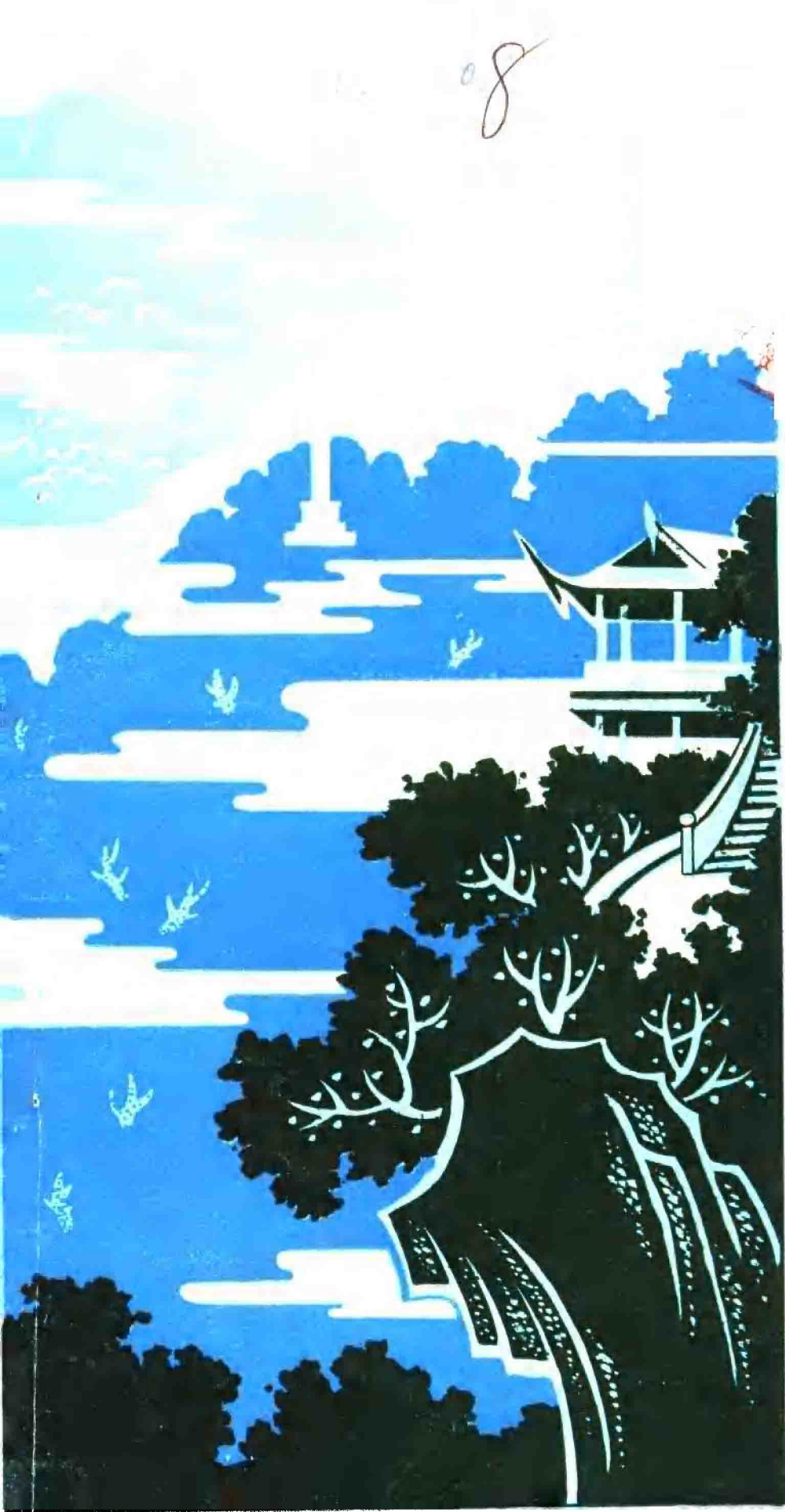




长汀文史资料

85

第八辑

长汀文史资料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长汀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室

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

目 录

文 史 资 料

- 永恒的怀念——纪念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王其森 (1)
- 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汤家庆 (6)
- 囚室榴花·····童家贤 (11)
- 在艰苦斗争的日子里·····彭胜标 (12)
- 罗明在汀州传达“六大”精神·····康模生 肖爱莲 陈伟田 (16)
- 河田阻击战前后·····赖荣光 (19)
- 中华苏维埃银行福建省分行的一些情况·····谢镇成 (21)
- 坚持革命斗争的芦竹村人民·····范云龙 (23)
- 回忆遵义城战斗片断·····岳连山 (26)
- 两篇具有史料价值的战斗檄文·····邓永华 于莲花 (27)
- 路易·艾黎在长汀·····范绍康 (29)
- 刘亚楼同志关怀母校——长汀一中·····任 全 (32)
- 忆士恺·····吕 沁 (33)
- 忆昔见闻和老师的教育·····李鸿模 (36)
- 闽粤赣边从前主要航道——汀江·····枫林 紫冰 (39)
- 略谈北京汀州会馆·····王其森 (42)
- 长汀县中简史·····曹培基 (44)
- 长汀印刷史漫话·····毛河先 (45)
- 长汀县各界抗敌后援会与抗敌剧团·····曹永德 (48)
- 汀州“阴塔”史话·····邓永华 谢镇成 (51)

历 史 考 究

- 从文物考古分析长汀的历史·····范汝森 (51)
- 隆武蒙尘考与郑成功义军克复汀郡·····枫林 邹子彬 (56)
- 纪晓岚与长汀·····林衍仁 (59)

临 汀 文 苑

- ✓ 赠陈鼓应教授·····李 欣 (60)
- 汀州纪游·····罗心如
- 临汀散叶·····邹子彬
- 封二·····邓木榕供稿
- 封三·····范汝森 邓木榕 邓永华摄

永恒的怀念

——纪念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

王 其 森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上午，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杀害于福建省长汀县城西门外的罗汉岭，至今五十周年了。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之一，是一位才识卓越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宣传家和文学家，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的英名将永远载于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千古不朽。

(一)

解放后，为了缅怀瞿秋白同志的功绩，党中央决定把他的遗骨从长汀迁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同志为瞿秋白烈士墓题写了碑文。在瞿秋白同志牺牲二十周年的时候，举行了遗骨安葬仪式，陆定一同志代表党中央做了《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长汀县人民政府在烈士牺牲所在地罗汉岭，建立了高达三十米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还修复了秋白同志就义前的饮酒亭和被监禁的囚室，展出了烈士一生革命斗争的文物和照片，供国际友人和来自全国各地干部群众瞻仰学习。一九六四年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同志亲临长汀，缅怀烈士忠魂，亲自在秋白同志纪念碑前栽种了柏树。于今纪念碑四周松柏苍翠，绿树成荫。每当清明时节，长汀县党政军及各界人民团体（见封二）纷纷前往敬献花圈，以表深切的哀悼和怀念。



瞿秋白、杨之华同志一九二四年于上海。
邓木榕供稿

但是在十年内乱中，林彪、“四人帮”一伙，颠倒黑白，罗织罪状，肆意歪曲烈士在狱中所写的《多余的话》，污蔑秋白同志为“叛徒”。在北京砸毁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瞿秋白墓碑；在常州挖掉了秋白母亲之墓；在长汀拆掉了秋白饮酒亭和砸烂秋白革命事迹陈列室，还企图炸毁竖立在罗汉岭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十年浩劫，不仅使已长眠于九泉之下的瞿秋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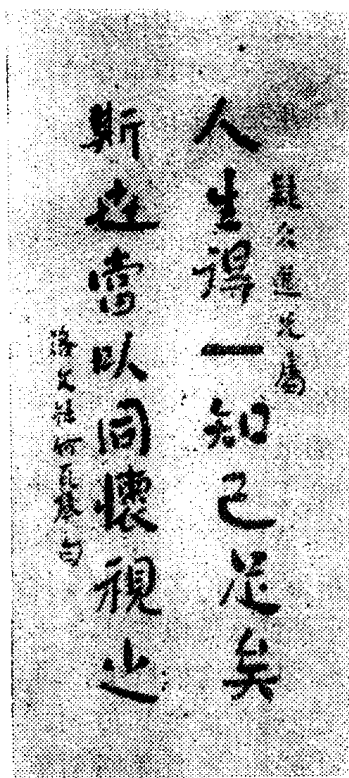
烈士备受凌辱，而烈士的家属和生前战友也惨遭摧残。但是，人民的慧眼终究能够透过层层迷障、识别奸凶和忠良，即使在那泰山压顶的情况下，长汀人民仍然妥善保护了秋白革命斗

争事迹的有关史料，秋白烈士纪念碑，仍巍然屹立在罗汉岭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彻底纠正了一切冤、假、错案，满天阴霾全被扫清，瞿秋白烈士的冤案也终于平反，得到全国人民拥护，长汀县人民从心底里高兴。在各级党委的重视和领导下，遭受破坏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得到了重新整修，陆定一同志还为瞿秋白烈士纪念碑题了字。

(二)

瞿秋白同志之所以为人民深深怀念，是由于他对共产主义无限忠诚，为革命呕心沥血，勇猛战斗，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



红军长征时，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瞿秋白同志，因身患重病，奉命转移上海就医。不幸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在长汀县水口乡小迳村被俘，关押在上杭县监狱。秋白同志在敌人严刑和死亡的威胁面前坚贞不屈，无所畏惧，未暴露身份。在上杭监狱，秋白同志用林祺祥化名给鲁迅、周建人写信，信曾写道，管监狱的人告诉他，如果有殷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可以保释。杨之华同志看了瞿秋白给鲁迅、周建人的信以后，亲手做了两条裤子，连同鲁迅送来的五十元钱，从邮局寄给了瞿秋白（即林祺祥）。鲁迅、周建人在上海设法筹集资金，计划开一个铺子，准备营救瞿秋白出狱（见封二）。但是，不久，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鲁迅看后，木然地坐在椅子上。瞿秋白牺牲后，鲁迅身抱重病，编辑出版瞿秋白的遗文《海上述林》。鲁迅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以示全中国人民都在缅怀瞿秋白烈士不朽的革命生涯。

一九三二年鲁迅赠给瞿秋白的对联。

邓木榕供稿

(三)

瞿秋白的身份暴露后，于五月九日被押送到长汀县城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关押在预先准备好的“特别优待室”，对待秋白同志采用了以执礼之名，行软化之实的策略。

当晚，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亲临探望，一见面就称瞿秋白为先生，而秋白同志不无讥讽地回答：“我现在不是你的先生，而是你的阶下囚。”宋希濂在这尴尬的情况下，扭转话题说：“我也到上海治病，刚刚回汀，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人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瞿秋白同志严词批驳宋希濂说：“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



瞿独伊同志（秋白女）一九八四年摄于瞿秋白同志囚室门前。

邓木榕供稿

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目的是要消灭剥削，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宋希濂默然地走了。

第二天，以关心瞿秋白同志的身体、生活为幌子的参谋长向贤矩、参谋彭励来到优待室，向贤矩皮笑肉不笑地说：“师长交代，要我指定中尉副官主管你的生活，吃官长饭菜，烟、酒、牛奶、饼干随时可供应，派一勤务兵为你送茶、送饭。收拾房间，派一勤务为你买东西，派一上尉军医照拂医药，准许你到“新生活”俱乐部阅书报。”还未等向贤矩讲完，彭励就急不可待、单刀直入地问道：“先生在上海一定和文化界许多有名志士一起，做了很多令人敬佩的工作吧？”秋白同志软中带硬地回答：

“我因患肺病，一九三一年就告长假休养医病，从此脱离了政治和文化舞台。”寥寥数语，巧妙地掩护了在上海的党组织及鲁迅等战友。彭励仍不甘心地询问，留守根据地的指挥领导权是否由秋白全负责时，秋白同志说：“我是在党中央的决议下，以主任名义负责指挥全责的。”实际上，当时中华苏维埃政府办事处的主任是项英，副主任是

陈毅同志，他以这样的回答，掩护了项英、陈毅同志。红军长征时留在苏区的游击队约有三万多人，秋白同志时而说只有四、五千人，时而又说是六、七千人，使敌人根本无法得到具体情况。

当时不仅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连续审讯秋白同志，而且不少国民党报纸的记者也纷纷来到长汀采访，企图从他身上得到一星半点作为欺骗宣传的口实，但都破灭了。秋白同志的坚贞不屈，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中统局主办的《社会新闻》中说：“瞿之狡猾恶毒，真可谓至死不变，进既无悔祸决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所以瞿秋白之处死，实属毫无疑问。”

(四)

六月二日，蒋介石在武昌行营给蒋鼎文发了一密电：龙溪绥署蒋主任：寒已法电悉。成密。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正。冬行息孚印。尽管如此，南京反动头目陈立夫还派其心腹、中统局训练科长王杰夫亲赴长汀，最后玩弄了一次劝降阴谋，妄想从秋白同志口中查明共产党在上海、香港的地下组织关系和在江西的“潜伏计划”。王杰夫抵汀后，对秋白同志采用送礼、喝酒、谈所谓“英雄列传”、作诗填词等手段百般进行劝降。谈话进行多次，王杰夫假装介绍秋白在上海的家属亲友的情况，特意述说了一些叛变革命以后的叛徒生活状况，进而摆出要秋白帮助国民党做编译工作，或介绍到大学担任教授，妄图以此动摇秋白同志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信念。但是，瞿秋白同志总是严词以对，或愤然视之，最后干脆拒绝回答，置之不理。从而使敌人的招降阴谋彻底破产。从三十六师为王杰夫回南京饯行席上之谈话也足以说明。王杰夫哀叹地说：“我们不能作到使瞿秋白为我们所

用，这就说明我们工作的失败。”宋希濂说：“我们作了不知多少工作，南京军委会也派了专员来，他们办理这样的案子很有经验，结果也是无功而返。”又说：“要瞿秋白为我们国民党所用，实在等于作梦。他在师部还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宣传，我们师部有些人对他看法就不正确，他多在师部一天，我就不放心一天。”

瞿秋白同志自知敌人必将下毒手，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月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对为革命而死早有精神准备。从五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写了一篇约二万字的《多余的话》，秋白同志在这篇最后的遗文中，记述了一生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艰难曲折的过程，是坦率的真诚的自我解剖的临终留言。文中虽然流露了消极情绪，但是他的内心世界是诚实的，襟怀是坦白的。

(五)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国民党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照往日一样以关心瞿秋白的姿态来到“特别优待室”，有意把蒋介石的处决密令暗示于秋白同志，希望这位蜚声中外的共产党人，在死刑面前有一点回心转意，那岂不是意外之功。然而参谋长的美梦破了，秋白同志与往常一样，神态仍然沉静、安祥，毫无惧色。

六月十八日，长汀上空阴云密布，三十六师师部警卫森严。早晨八时，秋白同志已起床整理了铺盖，梳洗毕，正临窗铺展宣纸时，三十六师特务连长廖祥光闯进囚室，冷笑地说：恭贺瞿先生，今天是你的好日子，宋师长请你去中山公园。”说完即出示枪决命令，两眼注视秋白同志。只见秋白同志脸不改色，眉梢舒展，饱蘸浓墨，从容挥笔，写下：“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绝笔诗，并附跋语，末署“秋白绝笔”。然后，秋白同志整理衣履，随着廖祥光缓步来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今天我们从这幅珍贵的遗照可见秋白同志的最后的风采，他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的白布短裤、黑袜、黑布鞋，背着双手，昂首直立，好一派肃穆的气概（见封二）。据天津《大公报》报导，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国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他健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白干一瓶，他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至半酣，悠闲地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中快乐，辞世长逝为大快乐！”饮毕，由向贤矩陪同，步出公园，慢步经西外街走向刑场。沿途唱《国际歌》。到达罗汉岭前刑场后，秋白同志在草坪前的土堆上说：“此地很好。”坐着饮弹，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六)

瞿秋白同志在狱中同敌人不屈的斗争和英勇就义，当时长汀人民是耳闻目睹，深为感动的。艺园照相馆摄影师赖韶九，为秋白同志拍摄过三次照片，都不知道是瞿秋白，但是他那种英雄气概，视死如归的精神却铭刻在他心中。秋白同志就义的第二天，三十六师一些军官到艺园照相馆索取照片时，才透露出这是共产党的主要人物瞿秋白。赖韶九得知后，当晚，将秋白同志临刑照片重新放大，第二天用镜框镶好挂在店门橱窗内。并把照片珍藏到解放后，主动的送交给人民政府。瞿秋白同志被俘后，长汀地方党组织，也暗暗地进行关注，制订了营救的计划，但未得实现。秋白同志就义当天下午，殡葬人员张桂福等把秋白同志的遗体葬于罗汉

岭盘龙岗。

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一九四九年十月，长汀终于又解放了。一九五〇年，中央派来南方老区访问团，谢觉哉团长深入了解瞿秋白同志的就义地点，指出：要找到秋白同志的遗骨，要为秋白同志建墓立碑。而后，经过多方调查，找到了殡葬人张桂福，根据他的记忆中的埋葬地点和瞿秋白同志着的对襟上衣是铜扣子的情况，进行了揭棺取骨，果然发现二个铜扣子，经送杨之华鉴定，才确认是瞿秋白的遗骨。一九五五年，长汀县人民政府派专人送秋白同志遗骨上北京时，举行了隆重仪式，追悼革命烈士。

瞿秋白同志才华横溢，智慧过人。二十岁参加了震撼中外的“五四”运动，致力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二十一岁，不远万里考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十三岁，任上海大学教授；二十八岁，当选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三十二岁，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在如火如荼的战斗岁月，他把自己一生全部才华力量和心血都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今天，秋白烈士纪念碑已得到整修，象不屈的战士站在罗汉岭，耸立在人民的心中，所以人民称它为罗汉岭的丰碑。我们纪念瞿秋白同志，就是要学习秋白同志毫无保留地为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品质；学习他在革命征途中遵守纪律，襟怀坦白，严于解剖自己的高尚品格。瞿秋白同志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去战斗，去完成未竟的事业！

1985、3、21于汀州

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

汤 家 庆

瞿秋白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宣传家和文学家。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中央苏区时期，在“一苏大会”、“二苏大会”上，瞿秋白同志都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一九三四年初，他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红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中央苏区领导游击斗争，任中共江西分局宣传部长和中央办事处教育人民委员等职。一九三五年春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捕，同年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英勇牺牲。在中央苏区的一年多时间里，瞿秋白同志为党为人民忘我地工作，对中央苏区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办好文化教育

一九三四年二月五日，瞿秋白同志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红都——瑞金，担任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兼苏维埃大学校长。刚到苏区，他就投入了火热的斗争生活，着手制订计划，布置新的工作。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苏区文化教育工作计划》，并广泛征求意见，认真修改，然后才作为文件印发执行。①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他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身份出席了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各县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并作了关于新的教育政策的报告。在瞿秋白同志的指导下，会议通过了《江西省第一次教育会议的决议案》，决议案贯彻了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土地革命服务的方针，说明教育文化工作与当前中心工作任务“应当切实的互相联系起来”。会议动员一切学校和文化团体，切实地宣传教育群众，帮助主管机关完成收集粮食，春耕运动和整理与扩大赤色少年队的突击工作任务，以粉碎敌人的“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②

针对苏区教育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瞿秋白同志提出了正确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措施。他强调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应该紧密配合革命战争，为革命战争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指出：苏区教育必须“赞助革命战争”，而创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正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材。”③他要求一切教育机关在教学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和帮助学员在学习、工作中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和战争实际，提高工作能力和战斗精神。他严格要求每个学生同志，“都应深刻的了解自己的伟大的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严厉制止一切地方观念等不良倾向，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④

瞿秋白同志的这些主张概括起来说，就是教育必须为革命战争服务，为苏区建设服务；教育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一正确方针对中央苏区文化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瞿秋白同志善于团结知识分子，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发展苏区教育，最主要的困难就是缺乏师资。所以，如何利用旧知识分子为苏区教育服务是个关键问题。瞿秋白同志明确指出：“在教育文化方面，我们可以并且应当利用旧知识分子，即使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也可以利用。”只要是“忠实于苏维埃，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旧知识分子，我们仍旧把他们当做苏维埃职员看待，我们还是要督促他们，勉励他们积极工作。”^⑤根据他的意见，教育部门设法从白区聘请了几位有经验的老教师，并且在工作中尊重他们，发挥他们的特长。高尔基戏剧学校缺少教师，当时俘虏来的白军军官中有擅长艺术的，经过一时期考验，就让他们当教员。

瞿秋白同志还十分注意发挥干部的带头作用，他认为，要发展苏区教育，首先要培养大批的教育骨干，要“提拔和训练新的干部，尤其是妇女干部，要养成大批教育方面的‘群众之中的实际组织者’，要建立经常的监督和检查制度的基础。”^⑥当时，苏区创办了许多师范学校，培养了大批教育干部，特别是妇女干部。“在许多专门学校里面，妇女占着极大的数量，银行专修学校，有一期全部招收女生，在兴国一县，一千多个夜校一万六千多学生中，妇女占一万一千人，妇女识字组员一万五千三百余名，占兴国全县识字组员百分之六十。在许多学校中，妇女充当教员、教委主任，直至校长。”^⑦由于充分发挥了干部的骨干作用，使苏区教育有了大的发展。

在瞿秋白、徐特立等同志的努力下，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当时苏区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各种专科学校，列宁小学、工农夜校、识字组、俱乐部等，遍布苏区各地。据一九三四年三月，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的不完全统计，列宁小学有三千一百九十九个，学生约达十万人；补习夜校有四千五百六十二个；识字组有二万三千二百八十六个，组员仅江西一省约达十二万人；俱乐部有一千九百一十七个，参加活动的固定会员就有九万三千多人。实行义务教育的结果，使多数学龄儿童进入了学校；发展社会教育的结果，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了文盲的痛苦；设立各类专门学校的结果，为党和苏维埃培养了许多干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赞扬的：“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这里是一个自由的新的光明天地。这里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手里，工农和他们的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以政治上与物资条件上一切可能的帮助。”^⑧

因此，在革命战争的艰苦环境下，苏区人民克服了一切困难，积极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使文化教育之花在这“自由的新的光明天地”里结成了丰硕的果实。

二、倡导大众化文艺

在中央苏区时，瞿秋白同志兼管教育部所属的艺术局工作。他极力倡导大众化文艺运动，在文艺方面做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

第一，提出了“大众化文艺”运动的方向，制定了有关政策和制度。

瞿秋白同志针对苏区以戏剧为中心的文艺运动，提出了“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多样形式，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⑨当创办第一所戏剧学校的时候，他提议应以“高尔基”来命名，他说：“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在高尔基戏剧学校讨论教学计划时，他指出，学校要附设剧团，要到火线上去巡回表演，鼓励士气；平时按集期到集上流动表演，保持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搜集创作材料。^⑩在剧本审查制度方面，他指出：“凡剧本，没有经过预演是不可以肯定好坏的，剧本的成功，必须经过写和预演两步程序。演一次改一次，才有好的剧本产生。”^⑪这种实践第一，群众路线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为了加强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使文艺沿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向健康发展，瞿秋白为苏维埃剧团、工农剧社、高尔基戏剧学校和俱乐部制订了章程和纲要。一九三四年四月初，由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颁布的《苏维埃教育法规》，其中就包括了《工农剧社简章》、《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和《俱乐部纲要》等，^⑫详细地规定了各个组织的方针任务，从而使苏区文艺运动逐步走上了群众化、组织化、革命化的正确道路。

第二、注意培养文艺骨干，建立了一支宏大的文艺队伍。

瞿秋白同志说：“没有戏剧工作骨干，就谈不到什么工农戏剧运动。”在高尔基戏剧学校讨论教学计划时，他指出：剧校除设普通班外，应增设红军班和地方班。红军里面的文化娱乐工作与各军团剧社的活动是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戏剧学校如果不为红军培养干部就失掉了创办的重要意义。同时，他建议把瑞金云集区、长汀县和中央印刷厂等工农剧社社长调来训练，半年毕业。^⑬他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戏剧学校学员们的成长，并在百忙中给他们授课。在他的领导和关怀下，高尔基戏剧学校培养出一千多名学员，编成六十余个戏剧队，活跃在苏区各地，成为红军部队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文艺骨干。^⑭

第三、重视文艺创作和出版，繁荣了文艺创作。

瞿秋白同志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到斗争最尖锐的地方去，与群众紧密联系，体验各种生活。他说：“闭门造车是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来的。”“没有丰富的社会体验，就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高尔基就有极其丰富的社会体验，所以他的作品质量很高。”^⑮他还身体力行，曾几次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苏区建设和群众生活的状况，消除“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去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以达到对实际生活的深刻体验，并订出了自己的创作计划。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同志亲自带着中央剧团深入前线，进行战地演出。一九三五年春，在瞿秋白同志亲自领导下，中央剧团的三个分团，在江西于都小密中央分局驻地进行了文艺会演，演出了新创作的歌剧、舞剧、山歌、合唱、快板、活报等，瞿秋白同志参加了评议，并亲自颁发了奖品。

瞿秋白同志还发动和鼓励工农剧社社员开展集体创作，他曾说过：我们没有作家、戏剧家和作曲家，但我们可以搞集体创作，可以向山歌、民歌学习，把群众中的东西记录下来。为了带领大家写剧本，他自己先写了许多故事，要剧社同志改编成剧本。他认为创作的东西要为群众喜闻乐见，特别是在语言上应该性格化。当中央剧团演出创作话剧《无论如何要胜利》后，他召开了作者、导演和演员参加的会议，称赞这个剧的成功，同时也指出了不足之处。他说：“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务要使人一听就懂，愿

意听，欢喜听。让群众闭上眼睛听，也能听出来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讲话。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⑩他还十分重视收集和运用民间歌曲，他说：“民间歌曲，对群众的教育更大，由于歌词是发自群众肺腑的心声，内容通俗易懂，好听好唱，所以更受群众欢迎。”^⑪

在瞿秋白同志的指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开展集体创作，向民间艺术学习。这期间创作了许多剧本和节目，如话剧：《李保莲》、《堡垒中的士兵》、《追击》、《你教我打枪》、《摸哨》、《抢粮》、《埋伏》、《地雷》、《菜刀下的营长》、《收租粮》、《游击》、《我们的队伍来了》，舞剧：《搜山》、《突火阵》、《缴枪》、《冲锋》等，还有歌剧、儿童剧、活报剧和山歌小曲。这些创作的剧本，经瞿秋白同志亲自选校与编辑，出版了中央苏区唯一的剧本集——《号炮集》，他还写了序言，油印三百多份，发到全苏区，还设法由交通线送到上海出版。一九三四年五月，在瞿秋白同志主持下，创办了《苏维埃文化》月刊，第一期发表了瞿秋白的文章《文化战线的红五月》，李伯钊的剧本《无论如何要胜利》和戈丽的散文《春耕戏杂记》等作品。^⑫《苏维埃文化》的创刊和《号炮集》的出版，对繁荣苏区文艺创作，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指导宣传工作

瞿秋白同志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家。二十年代初起，他就活跃在党的理论宣传战线上，成为我党早期的最优秀的理论家之一。中央苏区时，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锐利武器，来分析国际国内大势，为中央苏区的理论宣传做出了巨大的宝贵的努力。

在他进入中央苏区之前，就对中央苏区的宣传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一九三三年八月七日，他在江苏省委编的《斗争》第五十期发表《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他在肯定《红色中华》报的主流以后，提出了六点意见：（一）党的领导作用反映得“非常之模糊”，“只有‘苏维埃建设’，而没有‘党的建设’。同样，工会的作用更看不见。”（二）“自我批评”“已经有相当的发展。但是还不够。”指出：新闻报道，正反两方面都要具体。（三）新闻报道只偏重于鼓动性的胜利消息，要求必须对“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都有明晰的叙述”，“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明了战斗的总阵势”。（四）要加强社论和论文的“指导作用”，做好解释和说服工作，“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反对官僚主义的恶化”。（五）要开展“工农兵通信运动”，组织“工农兵通信协会”，发动群众写通信。（六）建议中央局另出版一种《贫农报》，要求文字浅近，通俗易懂。^⑬

瞿秋白同志到中央苏区后，负责《红色中华》的编辑工作，他亲自撰写社论和论文，经常为编辑《红色中华》而工作到深夜。

一九三四年四月三日，《红色中华》头版刊载一组“春耕战线”简讯，瞿秋白同志撰写了社论《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社论首先指出当时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发出的关于春耕运动是建筑在群众的革命要求之上的，开展春耕运动是为改善群众“自己的生活”，“充裕红军的给养”，“粉碎敌人的封锁与‘围剿’”。社论要求各级组织要广泛动员群众开展春耕运动，要克服“官僚主义”，不要“空喊”，不要“抑制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与劳动热

忱”；同时不要放松“阶级警觉性”。社论号召苏维埃公民，“最大限度发扬革命热情，广泛的开展农业生产竞赛，劳动合作，以及农业技术的研究运动。”社论指出在春耕中要优待红军和军属，“劳动力首先要投在红军公田和红军家属的土地上”，使红色战士在前方毫无顾虑的进行战斗。”社论特别指出：春耕运动“是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一环”，要“运用过去的经验，创造新的工作方式、新的技术，开辟新的耕地，种植新的农产品，一切都为着完成与超过我们今年的春耕计划而斗争。”

一九三四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了中国大片的土地，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六月廿三日至七月七日，瞿秋白同志连续在《红色中华》发表论文《中国能否抗日？》。他引用大量材料，具体分析中国和日本双方的军事、经济、人民组织程度等条件，驳斥国民党散布的“中国无力抗日”的无耻谰言。文章在分析了日本武装力量后，作出论断说“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有着精良的器械，但是战争的胜败不完全决定于器械，而决定于使用器械的人。”他综观中国许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和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的种种弱点，得出结论说：中国“有力抗日”。他要求：“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们，必须抗日，必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以争取自己的生存，中国所有的工农士兵群众，所有的武器，如果都用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那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

从瞿秋白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明白晓畅的文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国内外形势，以铿锵有力的语言，唤起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斗志，为我党的革命宣传工作树立了典范。

注：①刘英《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载《北京日报》1980、6、16。

②丁景唐《关于瞿秋白同志的一些史料》载《解放日报》1962、6、18。

③④瞿秋白《在苏维埃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载《红色中华》148期。

⑤⑥瞿秋白《阶级斗争中的教育》载《斗争》62期。1934、5、20。

⑦⑧王昌期《苏区教育的发展》载《红色中华》。

⑩⑬⑯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载《人民日报》1950、6、18。

⑨⑪⑮赵品山《秋白同志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话剧工作》载《忆秋白》。

⑫⑰《江西苏区文学史》载《江西师院学报》1980第二期。

⑭丁易《文艺第一次和兵农的结合》载《中国新文学史研究》。

⑰庄东晓《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三期。

⑱周永祥《瞿秋白年谱》。

卜算子·囚室榴花

童家贤

秋白囚室在省苏旧址内。室外小院有榴花一株，每年盛
开于五、六月间，如红烛，似烈火，映天照地。

寂寂铁窗前，万朵榴花吐。

泪浥鲛绡腊炬红，曾送征人去。

长夜路漫漫，求索何曾住？

喜看骅骝卷地来，日照霞千树。

在艰苦斗争的日子里

——在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上的回忆

彭 胜 标

我出身在长汀县古城梁坑一个贫农的家庭，祖祖辈辈租种地主的土地，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家贫如洗。在我还不懂事的时候，父亲彭东千就去世了。19岁那年，母亲（刘永娣嫂）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我从小靠堂姐彭灶妹嫂照料，7岁那年给一家姓陈的放牛，13岁就进纸厂学徒。泪水和汗水伴着我度过苦难的童年。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国民党反动统治，地主恶霸的压迫剥削，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我们梁坑周围的几个村子，就有三个地主、土豪。一家姓陈有万金家财，人们称为五里大王。一家姓刘，这家是暴发户，剥削人民的手段是“高租高息”“利滚利”。还有一个姓丘，人们叫他“肉头地主”，平时装得很朴素，把钱埋在地下，他有好几座造纸厂。梁坑一带的山林土地都被这三家地主霸占去了，连古城的土地也被他们买了好多。广大穷苦农民没有土地，只得向他们租种，地租高达40%、50%，良肥田地租要100%，收成的谷子不够交地租。造纸工人的工资只有一、二毛钱，每逢年关，穷人只好向地主借债，第二年用苦力抵债。古城的反动势力有胡子垣、胡子英、彭古民、彭元升。胡子垣有三、四百人的武装。他们对汀西人民的压迫剥削十分厉害。广大穷人挣扎在苦难深渊之中。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不推翻反动统治，人民是没有出头之日的。1927年，汀州有了共产党组织，刘宜辉开始在古城开展秘密活动。他是省立长汀中学的毕业生，回家后开始在青山铺办“洋”学堂，宣传新文化，27年南昌起义军路过古城，他还随部队到了长汀、河田，回来后大力宣传贺龙、叶挺的军队好。这时他可能是共产党的人了。28年到古城教书，开展秘密活动。后来他当上了古城民团团总，掌握了二、三十条枪，控制了民团武装。这时，彭铁城在梁坑教书，公开宣传“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资本家！”我弟弟彭太坤也在这里活动。那时，古城成立了农民协会，提出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欠债不还”、“实行二五减租”、“一切权力归农会”等革命口号。我们梁坑农会领导机关设在岭下的一座房子里，刘宜辉的侄子刘垣清当大队长，我哥哥陈友梅是中队长，共分三个中队，每一个中队都有旗帜。梁坑农会领导范围包括社背、罗子畲、三箭脑、半岭亭、猪寮湾、白头铺、岭下、禾仓坑、大东坑、小东坑。农会收缴地主豪绅的田庄、契纸。

1929年红军首次入闽以后，毛委员、朱军长指示闽西特委组织暴动，配合红四军作

战。长汀党组织先后组织了新桥、南阳、涂坊等地暴动。红四军二次入闽以后，闽西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动摇了反动势力。汀州的土豪劣绅，得到红四军将到长汀来的消息，纷纷向古城、瑞金逃窜。古城离瑞金30里华，是交通要冲，党组织决定举行暴动，把这些反动头子一网打尽。

当时长汀党领导人有点奋夫、张赤男、王仰颜、罗化成、黄亚光等同志，长汀党组织直接领导了古城暴动。暴动前，从新桥（一说是城关）运来一部分枪支，暴动时加上民团武装，有四、五十条枪。

暴动时间我记得是九月初，那天晚上我弟弟太坤到纸厂叫我出来参加暴动，听说要打土豪，我很高兴。暴动从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组织了好几支队伍，主力在古城，一部分到三箭脑、梁坑一带，警戒汀州来援之敌，收拾这里的地主土豪。大、小东坑是刘昌为领导的。古城暴动的总指挥是刘宜辉，副总指挥是彭铁城，党代表兼政治委员是刘刚毅，大队长是刘复，还有余志平、彭诚等领导人，我当传令兵。在梁坑这支队伍，暴动几小时，就把逃到古城的反动头目全部抓了，有的当场枪毙，有的抓到坝下枪毙。

一个晚上，方圆八十里广大区域的乡村纷纷起来，包括猪寮弯、白头铺、禾仓坑、溜下、大、小东坑、荣坑、金竹坑、马角寨、元坑、苦竹等地。我们一直到天亮才回古城集中。第二天，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没收了土豪劣绅的土地财物，组织宣传队，到各乡村打土豪分财物，开仓济贫。宣传队向花桥、大、小东坑、元坑、上、下温地活动。在梁坑没收陈、刘、丘三家地主几千担谷子。在古城召开了群众大会，处决了七、八个土豪劣绅，活动了半个多月，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搞得热火朝天。

不到二十天，江西金汉鼎部队向古城进攻，我们部队向陈地方方向转移，共有几百人，九匹马、十二担银元。一夜行军，天刚亮到了陈地，由于没有经验，警戒不严，在搞饭吃的时候，长汀黄月波部队袭击我们。枪响后，我们的人还在睡觉，仓惶应战，大部队被冲散，被俘二十来人。刘宜辉同志也被俘押到汀州，被敌人剖腹分尸，死得很惨。一起被杀害的有七位同志，还有十二个同志被关起来，后经党组织援救越狱逃出。刘刚毅、余志平、彭铁城是当中的几个。刘刚毅、余志平带了部分人马转向上杭一带参加红军。被冲散的队伍大部分回家了，我们这一部分队伍向溜下方向转移在梅花嶺庙里集中了一百多人，二十来条枪，刘复任大队长，指定我当排长，后又来一位姓刘的同志任政委。我们坚持在古城、四都的杨梅排、燕子窝、兰田、楼子坝、荣坑等地打游击。30年春，与四都游击队汇合，成立汀西游击队，支队长彭诚，政治委员廖子春，中队政委黄成基，分成个三中队。这时四都有区苏政府，是我们的游击据点，经常进攻古城打胡子垣部队。上蕉、南岩、苦竹、燕子窝等地是我们的游击区，我们还配合江西杨子光部队打古城、汀州，还配合12军四纵队打过几次汀州。30年3、4月间红军主力到长汀，我们还配合红军在江西牵制敌人。古城一批批的赤卫队员参军参战。6月，我们一百多人开到汀州，编入红军新十二军102团，团长是毕占云，我们的连长是彭诚。

我参军后，第一仗是打蛟洋傅柏翠部队，没有成功，转到古田驻扎。后傅柏翠进攻我们，我军参谋长、连长被打死。我们反击敌人，俘敌七、八十人，都被我们处死。后来部队开到永定华水亭、虎岗一带，攻打坎市、湖雷等地。30年下半年，我调到12军政治部当宣传员，兼支部宣传干事，后派我到政治保卫队任政治委员，甘再文、刘梦槐是我的领导。

这时，苏区开始搞肃“社党”，丘潮是在永定被杀的，段奋夫是在连城被抓的，我们的营长、纵队参谋长也抓了。今天抓，明天抓，搞得人心惶惶。31年初，我们队编成一〇一团特务连，我任政委兼连长。我们连经古城过江西，在古城把区委、区苏干部二、三十人都抓了，当晚关在横街口一座楼上，晚上他们打死了哨兵逃跑，彭诚几个被抓回，押到桥头枪毙了。开到江西归中央政治保卫局邓发指挥，富田事件后，江西开始肃AB团，排以上干部五、六十人抓到五里岗杀了，肖军长也被杀掉了。

三次反“围剿”中，我们归红四军军部指挥，在高兴圩战斗中我负重伤。31年冬天，我回到古城任区委书记。32年间，李坚真书记到古城开会，把我调到长汀县委当巡视员，不几个月又调任政治保卫队委员，局长是阙初茂，执行科长是曾玉成。后我又回古城任区委书记，33年成立兆征县委，我调县委任监察委员会主席，直到34年9月间，敌人进攻瑞金、汀州时，我又回古城任区委书记。

汀瑞游击队的斗争历史我已写了“红都游击队”一文，发表在《闽赣路千里》这本书上。汀瑞游击队开始只是陶古区游击队，陶古区游击队是陶阳区游击队、古城区游击队合并而成，我原是在古城区游击队。敌人来进犯了，陶、古两区的游击队都撤出来了，上级党组织就把陶阳和古城两个区组织成陶古区，我当区委书记兼政委，胡荣佳当区游击队司令员，兼副书记。这样就变成陶古游击队，有100多人。苦竹乡也有游击队，它跟陶古游击队一起行动。主要活动在苦竹、朱子峰、黄石寨。当时国民党在古城苦竹乡建立了保甲制度，成立了联保办事处。一些曾在区苏维埃政府工作的人叛变了。带敌人到黄石寨进攻我们了，我们的住房被烧了。

以后，兆征县独立营来了，准备打苦竹，把联保办事处摧毁。苦竹乡内部的余玉辉和余森给我们带路（余玉辉当过兆征县苏维埃军事部长，余森当少先队大队长）。联保办事处顶上有一碉堡居高临下，有一个班的兵力，平时都放哨，晚上十几点钟后就进房休息了。摸清了这个情况，就包围了这个办事处，大门打不开，用斧头才破开，当时，林太福负了伤，我冒火了，报仇心切，抓了十几个人，杀了三、四个主要的，（名字记不起来，）还有一个女的。

从此，敌人到处扬言彭胜标杀人，这是敌人的毒计，迷惑群众，孤立我们，群众一时受骗，怕我们，这使我们很困难。应当如何争取群众呢，我和胡荣佳、曾玉成、张娣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来到了花桥，花桥的保长是王老狗，他是红军家属，高坊人，（离花桥有10多里路）。他有10多人的武装，相对来说他比较老实，先抓了他谈了几个条件，一是可让他继续当保长；二是要保护红军家属；三是要为我们送信送情报；四是我们打什么地方不得事先去报告，要等打过之后才能去报告。说好了，就放掉他，用这种办法能起起到争取群众，分化敌人的作用。

1934年10月——1935年1月间，古城区的每一个乡有党员三、四十人，成立了党组织，主力红军长征了，土豪劣绅返乡了，组织反动武装，过去在苏维埃政府工作的有些人叛变，带路攻打我们。他们先把群众同我们隔开，移民并村，我们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把粮食等东西藏在山上，敌人搜不到就放火烧房子，地下党支部全破坏了，我们在山上没有房子住，敌人住在山脚下，我们派人下山联系也断了线，派青年团书记刘春兰回来也没联系上。第二步敌人就进行搜山，在残酷的斗争形势下，有的人回家当老百姓，有的则动摇叛变自首。总之1935年，群众工作很难开展，敌人采用残酷的“三光政策”“连坐法”“十杀